



中国经济转轨中的 金融发展

武 志/著



科学出版社

中国经济转轨中的金融发展

武 志 著

本书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区域金融结构优化研究”(项目编号: 02JAZ790001)资助出版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北航

C1722196

F832/183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中国市场化改革为研究背景,以经济转轨中金融支持政策的设计、实施与退出为研究主线,以国有金融安排的内在逻辑与演进变迁为主要研究对象,将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相结合,数理分析方法与制度分析方法相结合,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对经济转轨中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并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的所谓“中国奇迹”给出合理解释,同时也为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轨迹与演进变迁提供理论依托。本书颇有创新,提出了区分名义金融增长与真实金融增长(即金融发展)、金融增长中的虚假成分及剔除、超常规金融增长假说、超常规金融增长后的平稳过渡、金融约束分析框架从存贷款市场向证券市场的拓展、金融三元主义等观点。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经济金融专业师生以及经济金融行业的科研工作者、实务工作者等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转轨中的金融发展 / 武志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03-040139-7

I. ①中… II. ①武… III. ①金融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8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6495 号

责任编辑: 马 跃 李 莉 / 责任校对: 范杰锋

责任印制: 阎 磊 / 封面设计: 无极书装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骏杰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7 1/4

字数: 342 000

定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快速发展。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相比，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在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同时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从而创造了所谓的“中国奇迹”或“中国之谜”。对此，理论的研究理所当然地聚焦于这一奇迹产生的内在逻辑及其背景上。

显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公有经济部门的平稳增长是转轨国家避免经济大幅衰退的关键。因此，研究顶托经济平稳增长的公有经济部门的资本形成机制，成为理解中国经济转轨的一个准确切入点。经济部门的资本形成，离不开金融支持；事实上，在中国经济转轨中，金融支持政策功不可没，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这种金融支持政策的实施才实现了“中国奇迹”的伟大成就。因此，本书从金融支持政策的设计与实施角度来展开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金融发展的研究。

本书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研究背景，以经济转轨中金融支持政策的设计、实施与退出为研究主线，以国有金融安排的内生逻辑与演进变迁为主要研究对象，致力于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隐性税收机制的解体、国家财政能力的迅速下降、经济平稳增长与体制顺利转轨的协调战略目标、公有经济部门的资本形成与资金支持、转轨经济中的金融支持政策、国有金融安排的超常规金融增长、以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为主要形式的金融风险的迅速积聚、后转轨时期金融发展的平稳过渡、财政税收制度的重建以及国有金融产权改革背景下的证券市场与地方金融发展等之间建立起严密的推演逻辑，并由此尝试构建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从金融角度对所谓的“中国奇迹”给出合理解释。

具有发展中经济与转轨经济双重性质的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尽管在前转轨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后转轨时期所面临的挑战可谓空前艰巨。因此，本书不仅可以对所谓“中国奇迹”或“中国之谜”给出合理解释，而且对于研究转轨时期的经济金融改革也具有重要意义：它既可以为讨论金融支持政策的生成逻辑及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特殊轨迹与演进变迁提供理论依托，又可以为金融支持的衔接、平稳过渡与最终退出以及金融风险的化解、后转轨时期金融发展的逻辑与路径等提供新的思路。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得到了有关专家的指导与帮助，科学出版社对于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

2013年12月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	1
1.1 本书的背景与意义	1
1.2 本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	3
1.3 本书的角度与方法论	6
1.4 本书的框架与结构	9
1.5 本书的主要研究贡献	12
第 2 章 金融发展理论	14
2.1 传统的货币金融视角下的金融发展理论	14
2.2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	19
2.3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	24
2.4 麦金农-肖金融发展模型的修正	32
2.5 内生金融增长理论	38
第 3 章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40
3.1 金融系统的功能：金融对经济的作用机制	40
3.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模型	47
3.3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经验研究	53
3.4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分析	60
第 4 章 中国经济转轨中的金融发展：金融支持政策框架	67
4.1 计划经济体制的演进与解体：财政金融角度	67
4.2 经济转轨中的金融支持	76
4.3 金融支持下的资本形成机制	87
4.4 中国金融发展及其测量	94
第 5 章 金融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	102
5.1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既有研究及其困惑	102
5.2 中国金融发展的修正测量：虚假成分及其剔除	110
5.3 金融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种理论假说	122
5.4 简短结论与政策建议	128

第6章 后转轨时期的中国金融发展：超常规增长后的平稳过渡	131
6.1 金融支持政策下的超常规金融增长假说	131
6.2 转轨经济国家的金融制度改革与设计	140
6.3 后转轨时期的金融发展逻辑：超常规增长后的平稳过渡	148
6.4 后转轨时期的金融发展路径：证券市场与地方金融	161
第7章 金融支持的衔接：证券性金融支持下的证券市场	173
7.1 转轨经济中的证券市场：证券性金融支持	173
7.2 证券市场初始的融资市场制度安排	184
7.3 从融资市场安排向投资市场安排的渐进过渡	191
7.4 国有银行风险化解与证券市场发展的协调	200
第8章 金融发展的多元产权推动：金融制度三元过渡中的地方金融	205
8.1 体制外金融安排与中国金融制度的三元过渡	205
8.2 地方金融的市场准入及其制度绩效	212
8.3 中国地方金融体系的改革与重构	221
第9章 经济转轨中金融发展的财政控制	228
9.1 麦金农的“经济市场化次序”理论	228
9.2 中国经济转轨中的财政金融能力演变	234
9.3 中国经济转轨中金融发展的财政控制	245
参考文献	254
后记	265

图表目录

图 1-1	全书研究的框架与结构	
图 3-1	金融系统功能示意图	42
图 3-2	资本积累和凯恩斯-拉姆齐条件曲线	52
图 4-1	国有经济部门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有工业产值增长	91
图 4-2	转轨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机制	94
图 6-1	一个包含了金融支持的体制内产出函数	132
图 6-2	中国经济转轨中的超常规金融增长假说	134
图 6-3	后转轨时期的金融发展与平稳过渡	160
图 6-4	典型国家的金融制度结构差异	162
图 6-5	政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施政路线	167
图 6-6	国有金融产权转变中的效率不对称	170
图 7-1	证券市场制度租金	181
图 7-2	证券市场的功能及其逻辑关系	186
图 7-3	信息租金、信息成本与证券市场制度效率	190
图 7-4	证券市场制度租金的消散	196
图 8-1	转轨中的增长结构变迁与金融三元主义	212
图 9-1	1978~1998 年中央财政能力与金融能力升降变化	245
图 9-2	改革以来中国财政价格补贴变动趋势	253
表 3-1	1985 年金融发展与实际人均 GDP	55
表 3-2	1960~1989 年经济增长与同期金融发展指标	56
表 3-3	1960~1989 年初始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	56
表 3-4	1976~1993 年证券市场流动性与经济增长	58
表 3-5	1973~1991 年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64
表 4-1	1952~1978 年资金筹措中的财政与金融	70
表 4-2	国有经济生产投资资金中财政与金融份额的变化	86
表 4-3	GDP 增长与资本形成	87

表 4-4	资本形成、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 GDP 的贡献率	89
表 4-5	公有经济部门的资本形成比较	90
表 4-6	国家财政收入中公有经济部门的贡献	92
表 4-7	1997 年中国金融机构数量与多样化程度	97
表 4-8	中国金融工具结构	99
表 4-9	信贷非政府化比率	100
表 4-10	存款货币银行对中央银行信贷依赖比率	100
表 5-1	中国货币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仅列出其中部分年份)	103
表 5-2	1978~1999 年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104
表 5-3	1999 年经济货币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106
表 5-4	货币化比率:中国内地与周边国家/地区的比较	107
表 5-5	中国的经济货币化与居民消费水平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108
表 5-6	中国与南亚三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较	109
表 5-7	中国的名义金融增长	113
表 5-8	中国居民储蓄相关比率	115
表 5-9	国有经济的贷款比重	118
表 5-10	中国股票市值及其流通情况	120
表 5-11	中国金融发展的修正测量	121
表 5-12	FIR' 与 Y、PY 的相关系数矩阵	122
表 5-13	制度剔除后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123
表 5-14	制度剔除前的金融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125
表 5-15	1952~1977 年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测量	126
表 5-16	1952~1977 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126
表 5-17	包含金融增长测量指标的柯布-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的回归结果	128
表 6-1	金融支持政策的成本收益	136
表 6-2	转轨经济对家庭和企业贷款占 GDP 比重	142
表 6-3	1991~1999 年转轨经济的银行改革指数	143
表 6-4	1999 年转轨经济的银行业发展状况	145
表 6-5	转轨经济的上市公司数量	146
表 6-6	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的国际比较	151
表 6-7	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的估算	152
表 6-8	日本银行的不良贷款:新旧贷款分类标准对比	153
表 6-9	两阶段的转轨——增长模型	154
表 6-10	1996 年转轨经济国家的股票市值与年均交易额	165
表 7-1	中国证券市场的股本结构与流通情况	178

表 7-2	不同国家或地区证券市场初始回报水平比较	183
表 8-1	1978~1996 年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工业产出比重	206
表 8-2	1985~1996 年金融机构对非国有部门的贷款份额	208
表 9-1	财政赤字与经济绩效(与 GDP 之比)	232
表 9-2	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变化	235
表 9-3	中央政府汲取财政能力的国际比较	236
表 9-4	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占比变化	237
表 9-5	各地区财政盈余占 GDP 比重	238
表 9-6	1978~1993 年中国财政盈余(赤字)省份数目	240
表 9-7	中国的铸币收益	242
表 9-8	中国预算赤字及筹资情况	243
表 9-9	政府支出总量与支出结构	252

第 1 章

导 论

1.1 本书的背景与意义

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相比，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在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同时又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从而创造了所谓的“中国奇迹”或“中国之谜”（麦金农，1993）。面对没有遵循麦金农的经济市场化“最优次序”理论而又取得伟大成就的中国经济改革以及其中的诱人魅力，理论的研究将理所当然地聚焦于这一奇迹所产生的内在逻辑及其背景上。对此，学术界提出了增量改革、体制外改革、试验推广等诸多理论解释。但遗憾的是，这些理论解释都只是为了在转轨过程中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并避免社会震荡；或者说，它们只是“中国奇迹”得以创造的策略而非根源。显然，改革之初的公有经济部门在经济中一直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对于渐进改革绩效及其内生逻辑的分析需要将研究视角从过去所一贯注重的非公有经济部门转向公有经济部门，否则将颠倒影响中国市场化改革绩效各因素间的主次关系。按照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高增长率总是被高资本形成比率所支持，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一直呈现显著的投资推动特征；但是内生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信息与监督问题却决定了进行财政分权以及市场机制引入的某种必然性，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则意味着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隐性税收机制逐渐解体，并直接导致金融资源的分散化与政府财政能力的迅速下降，由此衍生出的公有经济部门资本形成困境，使得社会总产出面临着其他转轨国家所经历的经济大幅衰退的严峻挑战。因此，研究顶托经济平稳增长的公有经济部门的资本形成机制重塑，成为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

为了获取日益分散的金融资源与金融剩余以弥补随改革而出现的国家财政能

力的迅速下降，国家致力于推动国有银行体系的重建与扩张，从而依托国有银行的信用垄断及证券市场的准入等最终实现了对公有经济部门的金融支持与租金补贴。而且，改革之初的低货币化水平使得体制转轨过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进程同步推进，一个巨大的货币化区间意味着，伴随着改革的推进可以产生巨大的货币化收益，从而避免了“通货膨胀陷阱”的困扰。事实上，改革以来中国公有经济部门保持了良好的增长纪录，对国民经济平稳增长、财政收入增加、社会稳定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作为体制变迁成本主要承担者的公有经济部门又通过资金漏损、技术扩散、人才支援、产品需求等形式推动非公有经济部门的快速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结构的衔接与梯次过渡，从而共同创造了渐进式经济改革的辉煌成就。因此，对于被麦金农教授誉为“中国奇迹”伟大成就的取得，经济转轨中金融支持政策的设计与实施功不可没。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在经济转轨中金融支持政策的实施下，才实现了被麦金农教授誉为“中国奇迹”的伟大成就；而经济转轨、金融支持与金融发展间的这种内在关系也演绎出了前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轨迹。

拉迪(1999)认为，以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贸易的扩张和巨额资本的流入来衡量，中国无疑是经济转轨国家中最为成功的一个。然而，中国还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如税收相对于国民产出水平的日益下降、银行系统蕴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并日益脆弱等；而且，尽管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滞后且极不广泛，但它却是推动体制转轨以提高经济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最终目标的核心。因此，从金融体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只完成了一半，而麦金农教授也告诫我们，“对一个高度受抑制的经济实行市场化，犹如在雷区行进，你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步”。改革理论的偏差往往会导致灾害性的后果，而在金融改革方面，这种危险远较其他领域更为严峻和深刻。因此，作为具有发展中国家与转轨经济国家双重性质的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尽管在前转轨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后转轨时期所面临的挑战可谓空前艰巨；而对渐进式经济转轨及嵌入其中的金融支持政策的设计与实施、公有经济部门的资本形成机制重塑等问题进行探讨，不仅可以对在体制转轨中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并避免“通货膨胀陷阱”的所谓“中国奇迹”或“中国之谜”给出合理解释，而且对于研究转轨时期的经济金融改革也具有重要意义：它既可以为讨论金融支持政策的生成逻辑及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特殊轨迹(即前转轨时期的超常规金融增长)提供理论依托，又可以为金融支持的衔接、平稳过渡与最终退出以及金融风险的化解、后转轨时期金融发展的逻辑与路径等提供全新思路。

1.2 本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

1.2.1 经济转轨中的金融支持

以“放权让利”为导线的市场化改革推进,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隐性税收机制逐渐解体,而国民收入结构也从“集财于国”向“藏富于民”转变。为了获取日益分散的金融资源与金融剩余以弥补随改革而出现的国家财政能力的迅速下降,从理论上讲,当时可供国家选择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两种:一是(显性)税收制度;二是金融制度。相对于税收工具,金融工具更容易得到执行。因此,金融制度相对重要性的增加促使国家迅速改变其偏好函数并进而做出增加国有金融产权比重的努力,为此国家致力于推动国有银行体系的重建和扩张,这直观地体现在银行分支机构的广泛设置上。在金融资源动员过程中,金融制度替代了一部分税收制度功能,而在随后进行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又进一步替代了财政制度功能。显然,金融安排的迅速扩张本身便意味着货币化进程的加快。有趣的是,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水平使得体制转轨过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进程同步推进,一个巨大的货币化区间意味着,伴随着改革的推进,经济中可以产生巨大的货币化收益,从而避免了“通货膨胀陷阱”的困扰。而且,从证券市场的发展来看,在国有银行的货币性金融支持难以为继之时,金融控制下的证券性金融支持只不过是国家为了对国有企业提供持续金融支持所“制造”出的又一项制度安排而已。因此,概括起来就是,面对隐性税收机制的解体,国家为了降低金融动员成本,通过政府对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开放及国有金融机构等进行金融控制,依托国有银行的信用垄断地位对居民部门金融剩余进行动员,再利用利率管制、信贷倾斜、资金供给及证券市场准入等手段为公有经济部门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与租金补贴。我们把这一系列低成本动员居民部门金融剩余,对公有经济部门提供资金支持与隐性金融租金补贴的政策措施,总称为转轨经济中的金融支持政策。事实上,改革以来的中国公有经济部门保持了良好的经济增长记录,避免了前苏联、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初期普遍出现的经济衰退的痛苦经历,对国民经济平稳增长、财政收入增长、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对于被麦金农教授誉为“中国奇迹”伟大成就的取得,经济转轨中金融支持政策的设计与实施功不可没。

1.2.2 金融增长与金融发展

经过几代发展经济学家的努力,人们已广泛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

的不同。“经济学家一般用经济增长一词指一国在一定时期中产品和劳务的实际产出增长,或者更恰当地说,人均实际产出增长……经济发展是一个含义广泛的词。一些经济学家把它定义为增长伴随着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虽然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没有发展的增长广泛存在。事实上,金融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关系。金融增长表现为金融资产规模、金融机构数量等的扩张;而金融发展不单指金融数量上的扩张,更主要的是指金融效率的提高,体现为金融对经济发展需求的满足程度和贡献作用,金融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金融发展。在本书中,我们综合运用6个指标来对中国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量,其中3个量性指标[货币化程度、金融相关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 FIR)和金融机构数量]都呈现极大的单调增长,而3个质性指标(金融工具结构、信贷非政府化比率和存款货币银行对中央银行信贷依赖比率)变动却并不是那么突出,甚至还出现反复,这暗示了20多年来的“金融业大发展”主要体现为量的扩张,而非质的进步;或者说是金融增长的色彩强一些,金融发展的因素弱一些。进一步地,我们对金融发展中的名义金融增长与真实金融增长进行了区分。由于中国金融增长是在国有金融安排与政府金融控制基础上实现的,因此这里的“名义”和“真实”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价格因素有别,而与制度因素有关。名义金融增长是指没有进行制度调整(或剔除),而真实金融增长则是指进行了相应制度调整。最后,依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我们将这种名义金融增长定义为金融增长,而将真实金融增长定义为金融发展。由此出发,我们在本书许多地方所提及的金融发展其意均是指金融增长,只是由于行文顺序而未作区分。

1.2.3 超常规金融增长

对中国金融发展中的名义金融增长与真实金融增长进行区分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渐进式经济转轨、金融支持以及金融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在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进行考察时,在区分金融发展与金融增长的基础上对金融虚假成分进行了估算,我们结合Patrick理论假说与发展经济学观点提出了“金融增长(数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质量)只能由经济增长所引致”的新的理论假说并得到了经验分析的证据支持。不过,这些分析主要是针对金融发展与金融增长所展开的,而对于其中对渐进式经济转轨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虚假金融成分(以两者的差异来衡量),似乎还缺乏更为系统的分析。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大胆提出中国金融发展的“超常规金融增长假说”:名义金融增长中的虚假成分可以视为一种“超常规金融增长份额”。事实上,中国金融增长的虚假成分从1985年以来逐步增加,而剔除虚假成分后的金融发展真实水平并不算高,与发达国家也存在较大差距;这说明市场化改革以来,在

政府的金融控制下,对于中国的金融发展我们一直存在着一种金融幻觉,而剔除其中的虚假成分也就等于打破了这种幻觉,从而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金融发展的真实状况。不仅如此,以虚假成分形式存在的超常规金融增长份额,其本身就是转轨经济中金融支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渐进式经济转轨得以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这一份额的存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才避免了像 CEE(中东欧国家)和 NIS(新独立的前苏联国家)那样出现“J型”或“L型”下降。如图 6-2 所示,如果没有 FIR 曲线(即 FIR'')在 OT_2 区间的凸起,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曲线将前转轨时期经历一次“J型”下降(如 GDP' 曲线)。或者说, GDP 增长曲线在 OT_2 区间内呈线性上升的部分原因可以由向上凸起的 FIR'' 曲线(即所谓的超常规金融增长曲线)来解释。

1.2.4 超常规增长后的平稳过渡

尽管“超常规金融增长假说”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的渐进式经济转轨,但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在于这种“超常规增长份额”并不能持久地维持下去,在 OT_2 区间内呈“倒 U 型”走势的超常规金融增长曲线(FIR'')在到达顶点 T_1 后将不可逆转地进入下降趋势;这样,在超常规金融增长的下降阶段($T_1 T_2$ 区间)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不至于出现停滞抑或下降,就构成了后转轨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一道棘手难题。求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是要看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能否生长出替补超常规增长份额的新的支持因素,使得中国金融发展在经历前转轨时期的超常规增长后得到平稳过渡,从而支持经济转轨的顺利推进(图 6-3)。对于“超常规增长后的平稳过渡”构想,我们认为,由于证券性金融支持的及时衔接,超常规份额在 $T_1 T_3$ 区间将得以持续平稳增长(FIR''')并遵循曲线 BDE 发展轨迹,而且在 $T_2 T_3$ 区间,由于证券市场自身的转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证券性金融支持(制度租金)的缓慢退出,超常规份额开始向真实金融增长平稳过渡并在 T_3 点转入真实金融增长的常规轨道,从而扭转超常规金融增长后的 BCE 演进轨迹的路径依赖,避免“倒 U 型”衰退走势(FIR'')及预期的“J型”或“L型”经济下降(GDP'')。此外,以市场化为取向的体制改革本身就孕育着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与产权主体的多元化,随着改革的推进,国家金融控制能力逐渐减弱将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本身便反映了国有金融产权形式的削减及其他产权形式的成长和竞争能力的增强。国家金融控制能力减弱的内在约束与其他产权形式成长的外部竞争压力,将迫使国家逐渐退出金融产权结构垄断并进而收缩其在金融增长中的作用,结果是金融增长将由前转轨时期的国家推动逐渐转变为后转轨时期的多元产权形式(主要体现为地方金融)推动。如果这一过程得以顺利实现,则名义金融增长曲线将在 T_3 点与真实金融增长曲线重合并顺利进入常规轨道。相对于其他转轨经济国家,中

国金融改革发展的路径显得独特而迥异，如果后转轨时期的中国金融发展能够在经历前转轨时期的超常规增长后实现平稳过渡，那么将会提供一个与西方历史经验相映成趣的制度演进案例。

1.3 本书的角度与方法论

1.3.1 研究角度

在对渐进式经济转轨的“中国奇迹”及嵌入其中的中国金融改革发展问题进行探讨时，研究金融支持政策的设计与实施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为讨论金融支持政策生成逻辑及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轨迹（即前转轨时期的超常规金融增长）提供理论依托，而且将为后转轨时期金融支持的衔接、平稳过渡与最终退出以及金融风险化解等提供全新思路。本书将从以下两个研究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第一，力图从经济转轨中金融支持的内生逻辑角度考察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特殊轨迹，从而对在体制转轨中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并避免“通货膨胀陷阱”的所谓“中国奇迹”或“中国之谜”给出合理解释。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始终具有投资推动的性质，经济的平稳增长需要巨额投资资金的支持，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导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隐性税收机制逐渐解体，国家财政能力也随之迅速下降。因此，经济平稳增长与体制顺利转轨的协调战略要求为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公有经济部门提供足够的资本形成与资金支持，从而防止体制内产出的急剧下降，避免前苏联、东欧国家在转轨初期所普遍出现的经济衰退现象。因此，寻求这笔庞大的投资资金成为了渐进式经济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这也意味着，在经济平稳增长与体制顺利转轨的协调战略要求下，改革方案的设计受到了政府目标取向的约束，金融组织、金融功能及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都必须服从于这一目标，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转轨经济中金融支持与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决定了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特殊轨迹；而内生于渐进式经济转轨的初始的低货币化水平也构成了其得以顺利推进并避免“通货膨胀陷阱”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平稳增长与体制顺利转轨的协调战略及经济转轨中金融支持的内生逻辑角度来考察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特殊轨迹，这一研究视角旨在将中国经济转轨中金融支持政策的设计与实施视为一个自然逻辑的过程。当然，对这一自然逻辑过程的“思考是从事后开始的，也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72b），它舍象了这一自然逻辑过程中的曲折与反复，也舍象了个人因素在其中的特殊作用。也许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与偶然性，但

是在“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 1979)的过程中, 这种忽略和舍象却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 力图从政府目标选择的角度考察中国经济转轨中的金融支持及在此基础上的国有金融制度演进与变迁问题。显然, 市场化改革以来金融支持政策的设计、实施及动态变迁不能简单地归于偶然的决策偏好, 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其中, 政府在转轨时期的经济平稳增长与体制顺利转轨的协调战略目标选择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政府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的价值观、动机与目标的有组织的行为主体, 可以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来改革现存的制度结构, 因此, “组织尤其是国家组织的最大化目标是制度框架的条件”(诺思, 1994b)。经济转轨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制度供求的非均衡, 这也是视制度安排为既定条件的新古典分析框架在研究转轨经济学时的一个重要缺憾。诺思(1994a)指出, “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有理论中, 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 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 在对制度变迁的分析中, “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 “由于国家界定产权结构, 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因此, 在对经济转轨中的金融支持及在此基础上的国有金融制度演进与变迁(中国金融改革发展)问题进行分析时, 从节约金融交易费用的角度进行探讨也许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但更多的需要结合政府行为目标及其内在逻辑来展开分析, 因为经济转轨中的国有金融产权垄断等许多问题很难用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来解释。而且, 不仅在前转轨时期, 金融支持政策的设计与实施需要从政府目标选择的角度进行考察, 即便在后转轨时期, 由于经济金融形势发展(金融支持政策下以银行不良贷款为主要形式的金融风险的迅速积聚等)导致金融支持政策的成本收益正在发生对比并渐次趋近其合理边界, 金融支持的衔接、平稳过渡与最终退出以及金融风险的化解等也需要从政府行为目标选择的角度进行考察; 也只有这样, 才能正确梳理后转轨时期国有金融制度演进与变迁的基本方向及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基本思路, 而国有金融产权改革背景下的证券市场发展与地方金融的市场准入也就很自然地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1.3.2 方法论

第一, 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相结合。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是一切科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 前者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来再现研究对象发展变化的本质特点, 确定其规律性; 而后者则从研究对象发生发展的自然过程中揭示其本质和规律。这两种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逻辑方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但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 “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所修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1962)。历史起点即为